

对“实践”的再认识

张 本

哲学面临很大困难。哲学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被社会看成多余的东西,哲学工作者有“危机感”。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哲学有没有实践性,怎样理解哲学的实践性?实践问题成了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这是个老问题。这里想谈谈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历史

马克思主义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自古有之,二者的结合也不是马克思的创举。马克思的功绩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于“实践”,从而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和自觉的道路。这个思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做了最概括、最精辟的阐述。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质,同时也就最为彻底地批判了唯心主义。批判是以“实践”的观念为基础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的,《提纲》的最后一条第十一条对此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下过定义,但是大体从1845年开始,他们的理论著述和革命活动都生动地体现了它的实践性,都是对它的具体、透彻的说明。他们对旧事物和旧思想的批判,总是能够揭示新的真理;他们揭示的真理,总是使人看到继续前进的行动方向;他们分析现实状况所得出的结论,总是随同现实的发展加以修正或否定,在他们的理论阐述中,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总是紧密结合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或思想。因此,他们没有象传统的习惯那样,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来完成哲学。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它的实质,但是明确把它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它们下定义,列举基本特征,使之体系化而成为经典的,是斯大林。这样做的积极方面是给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形式,消极方面是形成了一个僵硬的理论框架以及这个框架的标准化和权威化,西方通常把它称为“官方哲学”。人们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权威来维护,就使它越是失去科学的说服力,越是给它涂抹光艳的色泽,就越加掩盖了它的原有光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寓于它的科学性,而科学是反对任何权威的。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理论概括尽管很不全面,而且存在众所周知的种种错误,毕竟还是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这种哲学的基本内容。严重的问题在于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

‘导人，没有把“实践”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而且对“实践”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从而导致他的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标准化、权威化；这种倾向由于苏联片面强调中央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以及与此相关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恶性膨胀而被大大加强了。其主要表现和严重后果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概念、原理、规律、范畴等等都是客观事物的抽象，这种抽象一经产生，便脱离了客观的、感性的现实，而以先验的形式来描述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它们的存在和作用混杂的、交错的和运动变化的。因此，它们可以引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绝不可以当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而导致先验哲学。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就已经包含先验的倾向，它的标准化和权威化又大大发展了这种倾向，使它越来越脱离生活实践，越来越偏离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尽管苏联的哲学家不断改善、充实和扩展它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斯大林个人意志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二）对斯大林来说，往往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社会生活的状况来分析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制订方针、政策，而是颠倒过来，从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出发，根据策略需要，为既定的方针、政策寻求哲学论证。可是缺少科学依据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为它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的；勉强而为，只能改变哲学本身的唯物主义性质，到头来反而损害它的“权威”，使它沦为策略需要的哲学装璜。例如斯大林强制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在理论上就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基本上是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其它历史条件来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变革，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终于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哲学的“权威”也帮不了忙。久而久之，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分离越来越大，越来越脱离社会实践，只能依靠钻研经典著作，研究哲学史，利用新的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等间接知识，偶尔也直接总结局部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其自身。生活的发展几乎没有推动哲学的发展，而哲学的发展也几乎没有推动生活的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可望而不可及。

（三）斯大林的理论框架形成以后，唯一能够纠正它的错误、弥补它的不足，为它提供论证的就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本人的论著。苏联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巨大贡献，结果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实质，而是发展了它的标准化和权威化；新的教科书一部比一部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也更富于权威性。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夭折的改革运动和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哲学仍然固守自己的阵地，凡是不符合标准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一概纳入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或者斥之为修正主义，照批不误，并且照例运用标准理论进行标准批判。为了维护和显示这种标准哲学的权威，还把这种批判扩大到科学研究领域、文艺创作领域和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并且用维护权威的方法来进行批判。结果形成理论上的保守主义，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发展。

（四）哲学脱离了现实生活，同时也就脱离了群众。如果说斯大林的政治错误是压抑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如果说这种错误之所以长期得不到纠正是由于滋长官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长期得不到改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而是作为标准的理论框架和僵化的思想模式强加给群众；或者说，由于标准化和权威化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它的实践的本性，而成为外在于群众、对于群众来说异己的东西。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确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在很大

程度上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观把群众从陈腐的哲学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没有实现,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在苏联的影响下,我国也出现过众所周知的类似情况。我国的特点主要在于:

第一、我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它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小农经济,它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武装斗争,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我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完全符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带进革命队伍的大量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小农意识,主要依靠总结局部的战争经验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积累起来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使它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中夹杂着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存在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文化传统看,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高度发达,宗法思想严重,等级界限森严,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直到“五四”时期才明确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求“科学”和“民主”,掀起一场反对封建礼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运动。我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既缺少象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哲学那样的前身,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又与封建礼教、封建文学艺术、封建民间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等紧密结合,浑然一体,几乎没有发展成完整的科学形态;内容极为丰富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法思想同样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而且几乎不可能从近代的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和民主制度中吸取养分,达到欧洲那样的水平。因此,我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文化障碍重重,理论上的准备也很不足。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苏联,再传到我国,可以说是第三手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大论战,涌现出一批理论家和大量理论著作。列宁的不朽功绩之一是对理论上的争议采取民主的态度;他解决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问题,进行哲学论战,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思想,做出充分的科学分析和论证,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群众的天下主要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同时战争年代的条件也不可能广泛、深入地开展理论研究,更不用说哲学研究。建国以后,随同学习苏联的热潮,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包括哲学专家,从此苏联的标准哲学便在我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了。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政治问题,对待标准哲学的态度更是政治问题,于是大体上工农出身的干部讲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等等,知识分子出身的理论工作者讲书本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使标准哲学的研究也长期落在苏联后头。

二、理 论

为什么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呢?怎样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呢?

斯大林的哲学框架是以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为基础,溶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一体而构建起来的,只不过忽略了“人”这种物质的特性,因而“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这就是说,由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生成,由于自然界分化出人类社会,物质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没有人类社会的自然界进入存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特点在于它的主体性,单个人作为主体与周围的客体(包括自然界和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相对立,人类社会又作为主体与自然界相对立。这种对立的统一是通过

实践即感性活动实现的，并体现为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实践不仅作为中介，作为一系列中间环节把主体和客体从各个方面、各个局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联结为一个整体，而且本身就是单个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斯大林框架从根本上摒弃了“实践”的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倒退到旧唯物主义。

马克思把劳动看成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从劳动出发分析实践。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它是人体的活动，受生理需要和神经机能的支配。但是劳动还是有意识的活动，“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③劳动怎么会是有意识的呢？这是因为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时又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一方面发展了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随同劳动技能的提高加强了交往关系本身，使它变得经常而稳定。人的思想意识就是随同劳动技能和交往关系的同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劳动、交往关系和思想意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实践。实践是单个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不是从一般的因而也是抽象的物质概念出发，而是从感性的、具体的、具有一定存在形式的物质概念出发。社会和单个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实践的发展，包括分工和分化以及分工的关系和分化的关系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社会文化和个人主观意识（思想、感情、愿望、意志、信仰、爱好、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以及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创造力等等）的发展。所以实践不仅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而且是发展的，越来越丰富多采的活动；实践的客观性表现为它的内容和形式的无限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所描述的概念、原理、规律、范畴等等，不过是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发展的概括和抽象而已，核心的东西仍然是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全面、详尽地论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只是由于战斗的需要和时代的限制，仍然留下了一些我觉得似乎还要进一步学习和探讨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人们对实践的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精神发展。人的精神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互制约，这是客观的事实。恩格斯说过，“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④这里说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但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人的正常状态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界赋予的，而是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二是说人怎样创造他的正常状态受他的意识支配和制约，不可能去创造他没有意识到的状态。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的意识也不可能发达，而且更多的直接体现为创造他的正常状态的劳动，受劳动的制约。随同生产的发展，人的意识也相应地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他的不正常状态即片面状态和创造这种片面状态的劳动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意识不再受劳动的限制，在劳动以外同时也有相应的发展。马克思1844年在描述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不正常状态时就说明了这两方面的情形，只不过当时是把工人的精神发展和生产的发展对立起来，作为劳动的“异化”加以描述，例如“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精巧，工人越愚钝”。这种描述显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因而显然有可能被发展成这样一种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工人的意识越不发达，那么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只好依靠外力，或者工人成了纯粹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对劳动“外化”的描述又包含工人的意识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工人怎么会感到劳动之外的自在和劳动中的不自在呢？马克思后来仍然肯定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但是内容比较具体，提法也不一样了，例如在《资本论》中，对工人的异化劳动就做过这样的描述：“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

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识服从这个目的”。“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⑤由于受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始终还是一般地把生产发展和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对立起来，直到1875年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肯定：“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⑥

现代科技革命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生产发展必然伴随劳动者的精神发展。现代科技成为直接生产力要求劳动者掌握现代科技；服务行业的扩大表明生产劳动的集约化和闲暇时间的增加；物质需要的满足和提高促进精神需求的发展，并使新的物质需求越来越远离生理需要而更多地成为心理需要或精神发展的需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扩大了劳动者与外界的物质交往，从而也扩大了精神交往；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不仅成倍地增加了信息量，而且成倍地扩展了传播空间和成倍地缩短了传播时间；生产落后地区的劳动者可以选择生产发达地区的消费方式或者把它当做理想去追求；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的运用范围扩大了，主观选择的余地也增加了；人类屈服于自然界表现为征服自然界，人类征服自然界表现为保护自然界，一句话，人的主观意识和能动作用大大加强了。如果现在还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看成革命的主要动力，还把希望过多地寄托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物质冲突，还把物质生产状况看成分析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唯一理论依据，恐怕就不一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了。

（二）关于分工。分工与生产劳动密不可分。人类脱离动物世界，首先表现为人体各部分器官分工的发展；生产劳动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分工的发展，因而分工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⑦分工无疑是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第一个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就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章中对此做了集中的论述。他们明确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⑧但是由于对物质劳动的特殊关注，认为“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⑨因而精神劳动往往只是作为分工发展的消极产物和隐含在物质劳动中的从属因素加以论述。分工和联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自发地产生最初的私有制，并且自发地改变私有制的历史形式即私有制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联合的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⑩正是这种自发的、强制的、作为谋生手段被固定下来的分工阻碍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从而最终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要使个人获得自由发展，就要消灭分工的自发性，要消灭分工的自发性，就要改变生产组织，使社会生产条件受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它的基本前提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随同资本的集中及其垄断性质的加强，生产的宏观调节能力也在加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垄断资本生存的需要，也是垄断竞争的需要，并且还是人类共同生存的需要。其次，科学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而科学的进步是朝着世界性的分工和世界性的协作方向发展的。第三，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要求首先不是自由地发展智力和体力，而是自由选择如何发展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的平等

权力,是每个人的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而不必计较创造物质财富的多少。第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正在缩小,并且越来越不重要,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的进步,而不在于消灭自发的分工。今天,只就劳动的直观形式来分析分工的发展,显然具有片面性。如果把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联系起来,如果考虑到物质劳动蕴含的精神因素,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就会发现自发地形成的共同活动,已经不是完全无法驾驭的异己力量。今天,如果既从物质生产出发又充分估计精神发展来分析分工问题,就会发现消灭自发分工恐怕已经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目的,因而也不成其为思想动力。

(三)关于条件。任何规律都离不开条件;任何规律都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都存在于起作用的条件之中。自然规律在自然条件下自然地产生改变自然界的作用。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变自然界,条件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或人的社会存在,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存在。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起条件作用就是实践,所以实践是自然规律被人类利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因而自然界是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人又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人之所以能起条件作用也是由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承认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客观性,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是我们往往脱离条件,尤其往往脱离“实践”这个最根本的条件来考虑规律的作用,或者对“实践”这个条件做了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没有充分估计它的主观方面,结果要么规律不起作用,要么规律起了并非我们预想的作用。

总之,时代的进步表明,对精神生产、精神发展和精神作用的意义估计不足,片面强调物质生产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必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分析。我们常说的人的因素,就包含人的精神因素。在生产斗争中至少要充分估计人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在政治斗争中至少要充分估计人的革命要求和觉悟水平。恩格斯晚年曾经坦诚地批评自己和马克思,“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⑪类似的思想,在其它几封著名的信件中都做了精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从哲学思想上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本性,回到“实践”上来,恢复它的主观方面,把“实践”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三、当代国外对“实践”的探讨

长时期来,由于实践的主观方面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唯心主义仍有较大的势力,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⑫当代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思潮就是这种结果的具体表现,但是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实践”的主观方面做了积极探讨,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民主德国的赛迪尔和柯辛主要是在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上批评这个体系的缺点,跟我国也有的同类看法差不多,认为把“实践”限制在认识论范围以内降低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没有体现物质——实践——意识这个自然过程,导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脱节,而最重要的是没有充分反应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因此,应当把“实践”看成物质运动的最高形态,看成社会存在的物质形

式。他们的看法无疑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我觉得总的说还是带有用概念来论证概念的思辨倾向，还是没有根本解决标准哲学同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尤其是实践的主观方面问题。

（二）南斯拉夫“实践派”比较极端，这当然与1948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自尊心的粗暴伤害有关，同时也受50年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米·马科维奇可以算是极端的代表。他认为，“马克思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更为入道的世界来实现人的本性”。这个问题的哲学前提是：“人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即能够通过自由的创造性活动改变世界、实现他所特有的潜在能力和满足他人需要的存在”。因此，“‘实践’这个词既涉及主体，活动的人，也涉及客体，他在其中活动并为他的活动改变的环境。”^⑬他认为这样的实践是“辩证的实践”或“批判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人改变他的环境的辩证法，只存在于活动的人和被他的活动所改变的环境之间。他赞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自然辩证法所做的否定，但反对卢卡奇把自然和主体的人截然分开，因为这样就使辩证法失去了批判作用。

马科维奇理解的辩证法包括三个基本范畴：

首先是人的基本能力。他列举了感知能力，理性思维能力，想象力，交往能力，创造性的创新活动能力，调和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和志趣的能力，对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和挑选的能力，自我意识能力等总共八项基本能力。

其次是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占用和吸收外界物体，表现为内在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感知力量、生理力量和智慧力量不断对象化，表现为外在化的关系。需要在结构上又有三个重要的变量关系：一是基本能力和需要的关系，基本能力越发展，所达到的熟练程度越高，需要就越丰富多样，越精致美好。二是物质条件和需要的关系，物质条件不足，总要把眼光盯在满足需要上；物质条件丰足，需要的满足处于自然状态，便会产生高水平的需要。三是技术和需要关系，技术对以上两种关系起中介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发展人的基本能力；在不正常情况下，又会阻碍和压抑能力的发展。

最后是实践。这是最重要的范畴，就是前面讲的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它不同于劳动，劳动是被迫为了达到规定目的而使用限定的能力，是异化劳动对立的一极，异化劳动降低人，阻碍他实现潜在能力；它也不同于工作，工作受职业分工的限制，只能片面地使用人的能力，而且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达到工作范围以外的目的的手段，如取得威信、权力、别人的羡慕、爱情等等，而实践则是充分实现人的全部最优秀的潜在能力的对象化活动，所以是人格的自我肯定，人的最高的自我实现，是一种使人快活的活动，体现出艺术创造的种种本质特征。

辩证法就是通过以上三个基本范畴起作用的。它遵循五项原则，或者说表现为五个特征，即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自我决定原则、矛盾原则和超越原则。因此，马科维奇认为辩证法作为物质、社会和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已成过去”，只有作为哲学理论和批判方法，作为实践的方向才具有生命力，并将成为未来日益增长的需要。

很明显，马科维奇虽然把“实践”看成主体的人和他的客体环境的对立统一，但是第一、他说的“人”实际上只限于单个的人，排斥了生产关系和人类社会，所以带有严重的人本主义倾向；第二、由于把劳动和工作排斥在实践以外，实际上把实践抽象化了，所谓“基本能力”和“需要”也都失去了现实性和具体内容，人的最高自我实现成了空想；第三、他否定了自然辩证法，实际上也同时否定了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因此，他的唯物主义也并没有真正摆脱直观的性质。

(三) 卢卡奇在本体论问题上摔了跤。他之所以又最终地回到本体论的问题,与其说是通过哲学原理的探索,不如说是通过美学、伦理学和他的整个生活实践。人类社会无论作为自然界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作为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已经区别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却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⑭无机界的规律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如果不彻底摆脱传统本体论观念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区分无机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揭示社会作为物质存在的本体论特点,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特别是精神现象就解释不清楚。卢卡奇把劳动作为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的第一个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原发的、最基本的实践,作为无限复杂的社会实践的原型,通过分析这个原型来深入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我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可惜他未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便与世长辞了。

(四) 真正能够结合当代西方条件,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我认为还是葛兰西。他明确指出,“人与物质(自然——物质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产生统一……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⑮他的独特贡献,简单地说,在于充分估计和探讨“实践”的主观方面,把这个方面归结为蕴含在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不自觉的哲学思想,即常识的准则,而强调历史、哲学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三者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来分析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理论。葛兰西著名的“领导权”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理论分析。“群众中每个活生生的人进行实践活动,但对自己的实践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意识,尽管这种实践活动包含他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相当于他对世界的改造。他的理论意识实际上可以历史地对立于他的活动。”因此,通过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和对立方面的斗争,首先在伦理领域,接着在政治领域本身,产生对自己的批判的认识,才能形成自己高水平的现实观。”“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强调领导权的政治发展不仅体现政治——实践的进步,而且体现巨大的哲学进步。”^⑯葛兰西对实践的主观方面做了许多创造性的探讨,由于时代的限制,特别由于他只活到46岁,35岁以后才在监狱和疾病的条件下从事主要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论点没有深入和展开。

以上的分析极其简略,但这四种不同类型的理论探索同样表明,随同时代的发展,“实践”的主观方面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这种倾向很可能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开辟新的前景,使它焕发新的活力。

注释:

①②⑧⑩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5、38—39、3页。

③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7、536、3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4页。

⑬ 马科维奇:《实践》英文版第XXViii、6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

⑮⑯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英文版第402—403、333页。